

**欧亚地区政治进程****统一的欧洲抑或分裂的欧洲？\***

R·萨克瓦\*\*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来，戈尔巴乔夫的“大欧洲”和“大西方”设想落空，欧洲逐渐被制度和思想上的一元论所主导。制度上，欧盟变得老化，持续内嵌在大西洋安全体系中；并在物理边界上东扩，将俄罗斯排除在欧洲统一的方案之外。思想上，欧盟以后现代自居，追求规范性的价值观外交，扩员进程只是加剧了它的道德说教，观念的铁幕再次降下。俄欧对抗最终导致公开冲突，结束了冷和平时期。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秉持新修正主义立场，倡导反霸权的多元主义，在金砖集团的框架下谋求建立替代性的国际制度，提升了世界政治的多极性。欧洲的分裂将严重削弱它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关键词】**欧洲一元论 俄欧关系 欧盟扩员 东部伙伴关系

**【中图分类号】**D7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8)03-0008(16)

那些宣称赢得了冷战的人，有责任为实现持久的和平创造条件，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Great War）过后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强加给德国的惩罚性和平制造了冲突再起的条件一样，1989年后的和平秩序也反映了冷战不对称的终结。一方面，曾经维系苏联阵营的制度瓦解了，而在另一方面，大西洋安全体系得以维持，并最终扩大到囊括了它从前对手的大片领土。欧洲的后冷战秩序呈现出种种一元论的形式。与20世纪80年代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结束冷战时所追求的地缘

\* 原文题目为“*One Europe or None*”发表于 *Debate a Europe* 杂志（No.18, January-June 2018, pp.35-48）。作者授权本刊翻译发表此文。

\*\* R·萨克瓦（Richard Sakwa），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不同，一元论的冷和平（monist cold peace）强势推行，大西洋安全制度和思想固化于其中。这种一元论（monism）既是制度上的，也是思想上的，在一个封闭的秩序中相互强化，并且美化自身，不接受批评和改变。俄罗斯并没有被当作是该秩序下的国家，而是被排除在此一秩序之外。由此，后冷战时代的欧洲和平秩序根基不稳，导致了一种准对抗（mimetic rivalry）的循环往复。在俄罗斯，外部的挑战和内部的忧患再一次叠加，加大了克里姆林宫对威胁的感知。俄罗斯与欧盟和华盛顿的关系在合作与对抗之间来回转换，直到 2014 年定格在了一种冲突模式上。

## 多种欧洲

那些夹在当中、从前受制于莫斯科的国家，当然会抓住机会加入新的替代性安全体系，但此举强化了集团政治的竞争，这一直是冷战的核心。换言之，对冷战的负面性超越，创造了一种错误的激励结构，它没能克服冲突的逻辑，只是赋予它新的形式。戈尔巴乔夫由于在苏联晚期处理外交政策的不当而饱受批评。最主要的一点，是没能将关于禁止北约扩员的协议落实到纸面上。<sup>①</sup>这种批评，实际上是相当不得要领的。在发起改革（perestroika）和提出“政治新思维”时，戈尔巴乔夫寻求的是，制定出一种能够超越国内弹压和国际对抗逻辑的政策。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超越政治。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它也是十分现实主义的，回应了苏联社会和欧洲安全所面临的根本挑战。作为对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迁就西方安全关切的回报，俄罗斯理应在某种重构的安全秩序中被赋予相应的地位。这种期待并不是不切实际的。这至少是戈尔巴乔夫的算盘，也是俄罗斯的期许，直到 2014 年冷和平的瓦解。

在后冷战时代，欧洲有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可以走。第一条是追求戈尔巴乔夫所描绘的超越政治，创建一个“大西方”（greater West）。这种模型是一个真正多元的欧洲，其中包括欧盟、俄罗斯、土耳其和它们之间的各个国

---

<sup>①</sup> 有关讨论可参见 Mary Elise Sarotte, “A Broken Promise? What the West Really Told Moscow about NATO Expansion”, *Foreign Affairs*, Vol.93, No.5, September-October 2014, pp.90-97; idem, 1989: *The Struggle to Create Post-Cold War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家，这些国家通过深化制度的和其他泛欧洲的纽带而聚集在一起。<sup>①</sup>“较小的”欧盟应该在“宽欧洲”（wider Europe）的框架内发展，但同时应该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包括土耳其）建立某种特殊的制度化伙伴关系。<sup>②</sup>大西洋联盟应该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并致力于建设一个包容而公平的泛欧洲共同体，该共同体将成为新的大陆主义的支柱之一。这种方案将创建一个历史性转型的西方，其中俄罗斯将成为攸关其存续的创始成员。这种方案也将创建一个“大西方”，为欧洲主权国家体系提供一个发展框架：一些国家联合在深层次的区域组织里（尤其是欧盟），其他国家可以有选择性地参与其中。铁幕将成为过去，不同联合形式之间的明确边界将被移除。依此道路，有关欧洲安全困境的想法，将变得不合时宜。

这个“大欧洲”的选项，摆脱了以布鲁塞尔为中心的欧洲观，聚焦于一种泛欧陆的联合形式，它不仅借鉴了戈尔巴乔夫关于“共同欧洲家园”的思想，也借鉴了长久以来关于一个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的戴高乐主义（Gaullist）思想。<sup>③</sup>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它将导致北约和大西洋安全体系的解体，并创建一个对称且多元的欧洲。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将成为最重要的安全组织。20世纪90年代初被提议的欧洲安全理事会（European Security Council），也可能被建立起来。随着欧洲安全逐渐与大西洋共同体相分离，欧盟将肩负起更大的安全责任。由于欧洲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与美国的安全联系将变得多余。这个总揽全局的“大欧洲”组织，代表着“多元一体化的一体化”（integration of integrations），它将集合现如今变成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EEU）的那些国家，既开辟一个进程，又创立新生的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庇护之下，大陆能够团结在一起。这将是欧盟避免因持续地嵌入最初孕育它的大西洋体系，而发生老化的一种方式。

---

① Richard Sakwa, “Russia and Turkey: Rethinking Europe to Contest Outsider Status”, *Russie. Nei.Visions*, No.51, Paris, IFRI Russia/NIS Center, May 2010, p.21. 文章可见于 [www.pearltrees.com/ifri.russie.nei/651883/](http://www.pearltrees.com/ifri.russie.nei/651883/)

② Большая Европа. Иде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од общ. ред. Ал. А. Громыко и В. П. Фёдорова. 2014г.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③ Mikhail Gorbachev, “Europe as a Common Home”, Address to the Council of Europe, Strasbourg, 6 July 1989, 全文可见于 [http://polsci.colorado.edu/sites/default/files/1A\\_Gorbachev.pdf](http://polsci.colorado.edu/sites/default/files/1A_Gorbachev.pdf)

真正被遵循的却是第二条道路，这带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负面后果。北约扩展到了俄罗斯边境，1972年《反导条约》（ABM Treaty）在2002年被单方面废除，弹道导弹防御（BMD）系统被部署在了东欧。欧盟扩展到了俄罗斯边境。当然，也有一些缓和性的措施和安排，包括建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以及欧盟为缓解俄罗斯所遭受的排斥而出台的各种计划，其中包括“四个共同空间”和现代化伙伴关系。第二条道路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的组合，最终在其自身矛盾的重压之下爆发了出来。它实际上代表着冷战的延续，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这是一个冷和平的时期。我曾经在其他文章中论述过，它代表着一种“准冷战”（mimetic Cold War）。在其中，有冷战的争论和制度，但不承认冷战的事实。<sup>①</sup>这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岁月那样，是另一场“二十年危机”。欧洲安全的根本问题，没有一项得到解决。<sup>②</sup>

凡此种种，导致紧张关系逐渐积累，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些年，如预期般最终将爆发公开冲突。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是第一个重大信号，表明欧洲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并没有从大陆上消除，而它只是更为严重的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先兆。我们有理由谈论“欧洲的死亡”，因为冷战结束时，对于一个团结统一的新欧陆的渴望遭遇了挫折：“大陆欧洲”（continental Europe）由于沦为全球竞争的场域，再一次失去了自主的机会。<sup>③</sup>关于如何称呼这个冷和平之后的新对抗时代，争论十分激烈。最终我们称之为“新冷战”或是别的什么，都不那么重要。要紧的是，需要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在创建一种可以维持长久的欧洲和平秩序上，遭遇了重大失败。<sup>④</sup>本文认为，后冷战时代的欧盟已经变得老化——换句话说就是发育不良，不能实现根本上的进化发展——原因是欧盟仍然困在孕育它的大西洋“保护壳”里。“大欧洲”或者某些其他的构想，最终都被否定了。关于冷战结束

---

① Richard Sakwa, “The Cold Peace: Russo-Western Relations as a Mimetic Cold War”,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6, No.1, 2013, pp.203-224.

② Richard Sakwa, “‘New Cold War’ or Twenty Years’ Crisis?: Russia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4, No.2, March 2008, pp.241-67.

③ Richard Sakwa, “The Death of Europe? Continental Fates after Ukra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1, No.3, May 2015, pp.553-579.

④ 关于使用这个术语是过时和不当之举的有力论述，参见 Andrew Monaghan, “A ‘New Cold War’? Abusing History, Misunderstanding Russia”, London, Chatham House Research Paper, May 2015.

的一元论解释，得到了巩固强化。随后，一元论的大西洋体系，通过现存的架构和理念的伸展而扩张，拒不接受冷战结束时戈尔巴乔夫及其俄罗斯继任领导人人为之描绘的转型路径。如今，这个一元论的体系主宰了西欧。

## 欧洲一元论与老化 (Involution)

“小欧洲”是一元论的，因为它不接受为欧洲的发展提出另一种合理的替代框架。尽管欧盟以“后现代”自居，但它的表述形式却是一种传统的现代主义元叙事 (modernist meta-narrative)，因此是自相矛盾的。欧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一元论的方案，尽管其内部具有强烈的多元主义色彩。欧盟对规范普遍性的主张，意味着它与邻国接触的目的，是要让它们变得更像欧盟自己。在其实际政策中，含有一定无害程度的实用主义，但它仍然是由一种说教式的议程所驱动。<sup>①</sup>在后冷战时代，这种一元论得到了加强，它的目标是要使整个欧陆，都成为欧盟的式样。

尽管欧盟迅速抛弃了“宽欧洲”的说法，并采用了“欧洲邻国政策”(ENP) 这个名称，但是目标仍然没有什么变化——通过限制条件 (conditionality)、联系条款 (Association Agreements) 和接纳一些新成员，使相邻国家发生转型。在原则上，“小欧洲”和“宽欧洲”与俄罗斯所倡导的多元主义“大欧洲”是相容的，但是这需要一个制度和外交的过程。双方都需要寻找某种“和解模式”，就像二战后超越法国和德国之间冲突逻辑的那种模式。西方所流行的“冷战胜利”话语，恰恰阻止了对这一和解过程必要性的认识。俄罗斯按照西方的设想，进行了足够多的转型尝试，而当它转型失败时，指责便随之而来。其中包括“谁失去了俄罗斯？”这样奇怪的话语。<sup>②</sup>

对莫斯科的立场进行预测所依据的假设是，一国的内部治理形式与它参与国际政治的模式之间，没有内在联系。这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假设之一，

---

<sup>①</sup> Tom Casier, “The EU-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allenging the Normative Argument”, *Europe-Asia Studies*, Vol.65, No.7, September 2013, pp.1377-1395.

<sup>②</sup> Kathryn Stoner and Michael McFaul, “Who Lost Russia (This Time)? Vladimir Puti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8, No.2, Summer 2015, pp.167-187.

它也认为民主和平论会阻碍不同政体国家间的正常关系。<sup>①</sup>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无限忠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因为在后冷战时代，俄罗斯一直积极参与或多或少限制主权的组织，特别是欧洲理事会、世贸组织，甚至在乌克兰风暴来临之前正在加入经合组织。俄罗斯国内无疑存在着治理问题，当局对公民社会和政治团体施加监督，影响社会发展和政治进程。<sup>②</sup>但国内的困局既是外交事务困局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这两个方面相互强化。

俄罗斯在国际层面上对多元主义的倡导，与其国内所践行的一元论是相互矛盾的；欧盟在国际政治中的一元论也与其内部的极端多元主义相对立。欧盟现如今被描绘成一个后现代实体的典型，追求一种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普世价值议程，并忠于一套规范性的原则。<sup>③</sup>这些规范是欧盟在与外部行为者以及邻国打交道时，提出限制条件的基础。在内部，欧盟呈现出一种新中世纪（neo-medieval）政体的特征，即，管辖权相互交织，没有单一的主权中心。<sup>④</sup>然而在外部，这些年欧盟的空间形态愈发固化。它的外部边界主要由申根规则来管理，单次签证可通行各成员国，且人员域内旅行无须持有护照。然而自 2015 年起，随着难民和移民涌入的压力，掀起了一波“暂停”和“筑墙”的浪潮。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sup>⑤</sup>在欧盟边界管理协调机构——欧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的基础上成立了。<sup>⑥</sup>现在谈论“堡垒欧洲”（fortress Europe）还为时过早，特别是考虑到德国在 2015 年决定接收 100 万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冲突地区的难民，不过危机充分暴露了社会-经济的、规范性的后现代主义，与欧盟确保与邻国及世界关系的安全，这两者之间的紧张。时间与空间发生了碰撞。

几十年的扩员，将欧盟推入了在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上都是未知的领

---

① 对民主和平论的驳斥，参见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Summer 2000, pp.6-18.

② Richard Sakwa, *Putin Redux: Power and Contradiction in Contemporary Russi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③ Robert Cooper, *The Breaking of Nations: Order and Chao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3.

④ Jan Zielonka, *Europe as Empire: The Nature of the Enlarged European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⑤ European Agenc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astline and Border

⑥ 关于该机构的职能，参见 <http://frontex.europa.eu>

域。<sup>①</sup>通过扩员实现扩张的动力，如今已经减缓，但在空间和规范的意义上的终点 (*finalité*) 还没有到达。在争议愈发激烈的周边地区，欧盟仍然在野心勃勃地推动转型。<sup>②</sup>正是这一点，使它与俄罗斯发生了对抗。这种冲突是双方都不想要的，也是双方都寻求避免的。欧盟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周边政策，以确保其领土的外层边界不会硬化成新的分裂线。罗马诺·普罗迪 (Romano Prodi) 的欧洲邻国政策，是调和内部与外部的更有想象力和包容性的尝试之一，长期作为欧盟与邻国进行边界和关系谈判的一个部分。<sup>③</sup>随着 2004 年和 2007 年大批后共产主义国家加入欧盟——其中大多数曾经是苏联阵营的成员或者甚至就是苏联本身——这种“谈判”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它变得不像一个 (它曾经那样的) 互动过程，而是变得更加说教。谢尔盖·普罗佐罗夫 (Sergei Prozorov) 认为，这种关系并没有建立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了老师与学生的监护原则上。<sup>④</sup>

这种关系显著体现在欧盟于 1999 年出台《对俄共同战略》<sup>⑤</sup>的方式上，尽管早期与俄罗斯官员有过一些沟通，“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单方面的行为。”这里并没有那么多“共同”之处，“因为它应该是伙伴双方 (欧、俄) 相互磋商的结果”，而此处所说的“共同”是指欧盟成员国的共同立场。<sup>⑥</sup>这同样适用于早先签署于 1994 年、但直到 1997 年 12 月 17 日才生效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sup>⑦</sup>，以及 1995 年签署的关于贸易问题的《临时协定》 (Interim Agreement)：“两者都证明是不适合管理这组双边关系的双边工具。”<sup>⑧</sup>早期的官方政策，赞同一个积极活跃的欧盟是欧洲稳定的基石，但是

---

① Jan Zielonka, “Europe as a Global Actor: Empire by Exampl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4, No.3, May 2008, pp.471-484.

② Bahar Rumelli, “Constructing Identity and Relating to Difference: Understanding the EU’s Mode of Differenti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1, 2004, pp.24-47.

③ Richard Whitman and Stefan Wolff (eds),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in Perspective: Context,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④ Sergei Prozorov, *Understanding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 The Limits of Integration*, paperback ed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⑤ Common Strategy on Russia, CSR

⑥ Marc Maresceau, “EU Enlargement and EU Common Strategies on Russia and Ukraine: An Ambiguous Yet Unavoidable Connection”, in Christophe Hillion (ed.), *EU Enlargement: A Legal Approach*, 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Hart Publishing, 2004, p.183.

⑦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

⑧ Maresceau, “EU Enlargement and EU Common Strategies on Russia and Ukraine”, p.184.

反对的声音也随之出现。时任苏联驻欧洲共同体代表弗拉基米尔·舍米亚滕科夫 (Vladimir Shemyatenkov) 认为,“尽管伙伴关系包含种种好处,但它(欧盟扩员)意味着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人)实际上被排除在了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区域之外。”<sup>①</sup>在安全政策中的排他(排俄)性进程,也出现在“后现代”的其他领域内。俄罗斯所设想的“大西方”、“大欧洲”均未能实现,其抱负遭遇挫败。

吸纳大批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加入,更强化了欧盟的说教本领。现在有人提出,由于这些国家与俄罗斯的历史关系,它们在理解俄罗斯的动机和行为时,处于独特的位置,即,他们更容易感知俄罗斯方面的动机。正如玛丽亚·马尔克索 (Maria Mälksoo) 所说,“(出于现实政治 [Realpolitik] 的种种原因) ‘老’欧洲似乎倾向于延续这样一种惯常的游戏,即,把俄罗斯的民主假象,看作至少是一种进步中的本意良好的行为”;然而,在爱沙尼亚加入欧盟后,该国外交政策议程中的优先项,就是“阐明这种彼此装模作样的危险,并且动摇传统西方/欧洲核心国家对于俄罗斯滥用民主的普遍无知。”<sup>②</sup>这种新的说教主义,尤其体现在 2009 年 5 月发起的东部伙伴关系<sup>③</sup>上,此举得到波兰乃至瑞典一些最坚决的反俄人士的支持。<sup>④</sup>尽管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对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进行了包装和软化,但是其中确实含有实质性的挑战内容。

有两个因素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一是作为后现代的、以规范为理念基础的欧盟,其所持的普世性抱负;二是作为以领土为实体基础的欧盟,与其邻国的实际接触。<sup>⑤</sup>这种接触既使用一系列传统的外交工具,同时附加其他条件。随着欧盟不断扩大,乃至涵盖了部分后共产主义区域,其二元性特征

---

① 引述自 Maresceau, “EU Enlargement and EU Common Strategies on Russia and Ukraine”, p.184

② Maria Mälksoo, “Decentering the West from Within: Estonian Discourses on Russian Democracy”, in Viatcheslav Morozov (ed.), *Decentering the West: The Idea of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for Hegemony*, Farnham, Ashgate, 2013, pp.158-159.

③ Eastern Partnership, EaP

④ Nathaniel Copey and Karolina Pomorska, “The Influence of Newer Member Stat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ase of Poland and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6, No.3, 2014, pp.421-443.

⑤ Christopher S. Browning, “Westphalian, Imperial, Neomedieval: The Geopolitics of Europe and the Role of the North”, in Christopher S. Browning (ed.), *Remaking Europe in the Margins: Northern Europe after the Enlargements*, Aldershot, Ashgate, 2005, pp.85-101.

实际上越发明晰。规范和空间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这两个方面都丧失了大量原始动力。随着入盟的限制条件本身在某些情况下变成了“有条件的”（conditional），即依赖具体的在地条件，原有的规范被软化和修改。比如，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两个国家直到今天仍然生活着大量主要是俄罗斯族的“无国籍人士”（non-citizens）。<sup>①</sup>而在空间方面，尽管欧盟长久以来试图超越边界的“界限”，并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初始成员国当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功，然而边界又卷土重来。边界的回归，并不只是出于务实的原因，比如对移民和难民的管理；而是表现为善治和在规范性上进步的世界，与另一边腐败和新苏维埃主义（neo-Sovietism）的黑暗野蛮国度之间的“疆界”。

赫尔辛基进程被认为是后冷战安全秩序的基石。该进程实际上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失的和平大会。只是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45年的雅尔塔/波茨坦会议不同，在高级别外交层面，冷战的结束是一种未经谈判的和平。《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的“第三个篮子”，第一次将人权放在了欧洲政治的核心位置。它在各种后续会议中被正式确定下来，并体现在发表于1990年11月的《巴黎宪章》（Charter of Paris）中。赫尔辛基进程鼓舞了一代东欧异见人士，他们要求本国的共产党政府遵守其在赫尔辛基做出的承诺。在当时，赫尔辛基协议的内涵，被认为是西方对苏联的某种胜利。<sup>②</sup>赫尔辛基框架对于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生根，绝对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西方胜利的论调一直延续到了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一些专门机构中被制度化，其中包括选举监察，该制度尤其关注后苏联空间，这种不平衡遭到莫斯科的激烈批评。

这种基于价值的传统，构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西欧思维，而它最终侵蚀

---

① Dimitry Kochenov, *EU Enlargement and the Failure of Conditionality: Pre-Accession Conditionality in the Fields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lphen a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8.

② 关于苏联被迫在赫尔辛基后续会议中做出让步的胜利论调，在最近解密的英国内阁办公室（British Cabinet Office）文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参见Nikolai Gorshkov, “Blame it All on Moscow: Secret British Government Papers Revealed”, Sputnik, 19 February 2016, with the documents at <http://sputniknews.com/europe/20160219/1035004117/blame-it-on-moscow.html>

了埃贡·巴尔（Egon Bahr）“以接近促转型”的传统。<sup>①</sup>正是后一种思路支撑了西德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但它最终消失在了顿巴斯（Donbas）的战场上。严重的道德绝对主义思维，在德国绿党人士当中尤其强烈。如今他们是对莫斯科批评最为激烈的群体之一（与之相伴的还有大批法国左派），他们是最热切的干涉主义者。这使他们与美国的自由主义鹰派，以及——也许是无意中——持转型议程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结成了同盟。这就是2014年后“新大西洋主义”（new Atlanticism）的构成。这种思想认为，要重振同盟的军事向度，同时主张一种攻击性的、自说自话的，以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sup>②</sup>“新大西洋主义”所设想的，是一种不断深化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争议之中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sup>③</sup>，会强化该大西洋伙伴关系。现在，欧盟的说教主义和一元论，被整个大西洋联盟放大了。一道新的意识形态铁幕，再一次分隔了欧洲，与之相伴相随的是欧陆安全的再军事化。

## 一元论、多极性与新修正主义

亨利·黑尔（Henry Hale）认为，政治学研究实际上无法解释和预测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因为它以理想的终点为坐标和目标，以距离该坐标原点的远近为判断的标准。<sup>④</sup>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GFC）之后，冲击西方世界的各种危机再次将正统的苏联信念——西方体系不可避免的衰落——提上了表面。正如2015年瓦尔代（Valdai）会议简报中所言：“世界正处在岔路口：主要国家的内部问题和非西方中心的力量增长，将会给我们带来一次革命性的爆破，抑或是发生缓慢而系统性的变革。”当前西方的主导

---

① 这方面的里程碑是1963年7月15日埃贡·巴尔在德国图青（Tutzing）福音学院（Evangelical Academy）的演讲，被称作“以接近促改变”演说，全文参见[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document.cfm?document\\_id=81](http://germanhistorydocs.ghi-dc.org/sub_document.cfm?document_id=81)

② Richard Sakwa, *The New Atlanticism*, Valdai Paper No.17, Moscow, Valdai Club, May 2015, <http://www.scribd.com/doc/266515275/The-New-Atlanticism>. 重新发表于“The New Atlanticism”,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special issue, July-September 2015, pp.99-109. 文章可见于<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The-New-Atlanticism-17695>

③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

④ Henry E. Hale, “Democracy, Autocracy, and Revolution in Post-Soviet Eurasia”, *World Politics*, Vol.58, No.1, October 2005, pp.133-165.

地位是被承认了的，但是有两个趋势不容忽视：“从欧盟到日本等美国盟友的相对衰落，以及它们与金砖（BRICS）国家在全球进程影响力上差距的缩小”。正如瓦尔代文件中指出的，一场“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秩序的革命性颠覆”并非不可避免，而是“仍然存在有序改革的机会”。至于俄罗斯，“相互依存正在变成一个压力和脆弱性的来源。”<sup>①</sup>这些观点只是支持了那些试图通过创建国际治理替代框架，使俄罗斯免于外部压力的人，与此同时强化了传统的外交工具和大国行为。关于西方相对衰落的预感或许被夸大了，但莫斯科急切地抓住全球权力均衡的转移，来强化它的观点，即，这个它一直没能加入的西方，已不再是它想要加入的西方了。

乌克兰危机强化了国际事务中逐渐增长的两极特性。一方面，大西洋联盟得到了巩固。另一方面，有迹象表明，一股与之迥异的反对霸权制度和组织的潮流正在出现。这股潮流目前还在初生阶段，但是正在逐渐增强。波波·罗（Bobo Lo）注意到，“克里姆林宫寻求建立另一种思想和政治的合法性，挑战西方关于全球治理和道德普遍主义的理念。”<sup>②</sup>这股兴起中的反霸权潮流，完全不像冷战时期那样正式和激烈，因为俄罗斯显然缺乏苏联的吸引力、意识形态魅力和经济资源。其他国家也没有理由故意与西方为敌。同样，所有人都很清楚单极主义的危险，尤其是当一个国家退出政治协调时所遭受的强制性暴力的威胁。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就是清楚的例证。此外，西方金融和治理工具的威胁也在上升，表现形式就是制裁。大国经济战争成了有效和平秩序缺失之下的又一种接触模式。<sup>③</sup>近些年出现了一种将美国规则应用到全世界的新教义，它提供了美国将其在所有重要权力领域的巨大主导地位，施加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另一种方式。<sup>④</sup>尽管如此，反霸权运动仍

---

① *War 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 A New International Balance as the Guarantee of Stability*, Materials for Discussion at the 12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Sochi, 19-22 October 2015, p.2; 全文可见于<http://valdaiclub.com/publications/reports/international-stability-and-balance-of-the-new-type/>

② Bobo Lo, *Frontiers New and Old: Russia'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IFRI Russia/NIS Centre, *Russie.Nei.Visions*, No.82, January 2015, p.9.

③ Mark Leonard, *Connectivity Wars: Weaponising Interdependence*, London,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ecember 2015, 文章可见于<http://www.ecfr.eu/europeanpower/geoeconomics>

④ 例文参见 Juan C. Zarate, *Treasury's War: The Unleashing of a New Era of Financial Warfar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3.

然保存着一定程度的活力。人们批评“一种以普世面目示人的强加的模式”，这激发了“对替代方案的需求”。<sup>①</sup>金砖集团的出现，通常被解读为反霸权力量组建的一个证明——反对霸权主义的理念，但它并不是一个人们所认为的反霸权联盟。<sup>②</sup>

有许多宏伟计划已经被提出，要建设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超高速交通通道，甚至谈到建设一条北京至柏林的磁悬浮线。这些计划所关注的焦点，首先是将现有的铁路轨道进行现代化更新，变为高速规格。中国正投资约 52 亿美元建设一条高速线路，先是从莫斯科到喀山（最初计划要赶在 2018 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时启用），并计划将这条线路延伸到中国。计划中的“跨欧亚发展带”（Транс-Евразийский пояс развития, ТЕПР），“将一种不同于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学实践的新地缘经济学，与一种新地缘政治学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地缘政治学的基础，是合作建设新的居民定居点，是源于欧亚思想、进行文明对话的地缘文化观。”<sup>③</sup>这个跨越大陆的理念于 1996 年诞生在北京，而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家们所说的“大陆桥”（continental bridge）思想，已经体现在了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之中，这是一个从曼谷延伸至布达佩斯的贸易和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对该计划的补充，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一项连接中国南海和地中海之间水路的计划。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人所称的“一带一路”<sup>④</sup>（后来更名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将把中亚和其他国家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网络。这些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管线和海关设施等。

规范性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正使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寻求出于任何特定的规范性考量而将自身的发展理念强加给他国。但是费奥多·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指出，它的“部分原因是一种甚至超过了西方自身程度的傲慢。中国确信自己在本质上是一个特例。北京

---

① *War 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 p. 4.

② Stephen Kingah and Cintia Quiliconi (eds), *Global and Regional Leadership of BRICS Countries*, New York, Springer, 2016.

③ Yury Gromyko, “Beyond the ‘BRICS’: New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Trans-Eurasian Corridor”, in Kees van der Pijl,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duc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5, pp.167-185, at p.167.

④ “One Belt, One Road” [OBOR]

方面认为，由于外国人不能领悟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所以没有必要试着向他们灌输这些东西。”<sup>①</sup>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卢基扬诺夫强调，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向中国实施某种新遏制<sup>②</sup>政策，欧亚大陆的形势更为有利。这不仅是指欧亚大陆本身，也是指它作为中国开拓欧洲、地中海和更远市场的替代路线。这就是美国的新丝绸之路（New Silk Road）计划，以及后来投资连接中国与欧盟之间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计划，背后的逻辑。在卢基扬诺夫看来，中国并不十分关注提升其在中亚的政治影响力，而是愿意让位给俄罗斯。但是在经济方面，中国的增长优势使它拥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对俄罗斯而言，机遇与危险并存。卢基扬诺夫并不担心俄罗斯会沦为中国的“原材料附庸”，“并因此丧失自由”。他认为“这纯粹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考量的主观评价。”他讽刺道，“出于某些原因，同一些观察人士主张，俄罗斯成为欧盟的原材料附庸会带来发展和进步，但与中国的同样关系就会不可避免地使俄罗斯陷入落后的深渊。”<sup>③</sup>这可能是一个相当乐观的看法。当前“大西方”和“大欧洲”方案的落空，可能会开启一扇创建“大亚洲”（greater Asia）之门。

俄罗斯就处在这些进程的“心脏”位置——中国仍在预备阶段。这一关键地位，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已然成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俄罗斯事实上挑战着经典的自由国际主义，同时又辩称它参与反霸权活动，并不否定自由秩序的原则。相反，俄罗斯是一种“新修正主义”（neo-revisionist）。它并不挑战从中获益甚多的国际法和国际治理体系，但是批评“霸权”国家的做法和对这些原则的明显滥用。对俄罗斯而言，化身修正主义的正是西方自己，而不是俄罗斯。同样地，俄罗斯谴责的并非国际法和国际治理的原则，而是伴随其应用的实际做法。在与欧盟的关系中，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立场，意味着它不

---

① Fyodor Lukyanov, “Russia must Exploit its Pivot East”, *Moscow Times*, 26 June 2015.

② neo-containment

③ Fyodor Lukyanov, “Russia must Exploit its Pivot East”.

能仅仅是欧盟规范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要成为欧洲命运的共同创造者。<sup>①</sup> 欧俄之争，不仅是围绕着那些具有争议性的具体规范，更是话语和规范之争，即，谁有排他性的权利，来声称自己的规范在欧洲是普适的。<sup>②</sup>

## 结论

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寻求平抑道德普遍主义的应用，后者通常被认为带有随意性和惩罚性；同时确保全球治理工具确实反映全球关切。在欧洲的冲突，只是在全球层面为多元主义代言（的国家），所面对的更大挑战的一部分。西方的制裁加快了俄罗斯寻找削弱美元手段的步伐，比如以黄金而非美元对石油定价，但并没有导致它退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帮助俄罗斯抵御制裁，金砖国家开始创建一种对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替代方案。该替代方案的兴起，将不同于西方一元论。正如瓦尔代辩论文件中所言，“大西洋共同体是一个价值统一的特例。相比之下，非西方国家共同强调多元的重要性，坚持认为一种‘现代国家和社会’的统一象征是既不值得向往也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一种更加符合多极世界状况的路径。”<sup>③</sup> 这就是俄罗斯反霸权战略的本质，该战略是其对欧洲和全球政治中的一元论愈发强烈抵制的一部分。欧亚大陆和“大亚洲”的这些发展变化，代表着俄罗斯摆脱大西洋体系一元论，和与此相伴的欧洲老化的一种方式。创建统一欧洲的失败，意味着欧洲可能不再被看作是全球政治中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一个”欧洲的缺失，意味着在全球事务中，欧洲不再举足轻重。

（译者 丁 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人员）

---

① Hiski Haukkala, “A Norm-Maker or a Norm-Taker? The Changing Normative Parameters of Russia’s Place in Europe”, in Ted Hopf (ed.), *Russia’s European Choi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35-56; idem,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Regional Normative Hegemon: The Case of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Europe-Asia Studies*, Vol.60, No.9, November 2008, pp.1601-1622; idem, “Lost in Translation? Why the EU has Failed to Influence Russia’s Development”, *Europe-Asia Studies*, Vol.61, No.10, December 2009, pp. 1757-1775; idem, *The EU-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Limits of Post-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② Hiski Haukkala, “From Cooperative to Contested Europe? The Conflict in Ukraine as a Culmination of a Long-Term Crisis in EU-Russia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Published online 3 February 2015.

③ *War 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 p.5.

---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wider Europe” and the “greater West” posited by Gorbachev failed to materialize and Europe was gradually dominated by both institutional and ideational monism. Institutionally, the EU attempts to avoid involution through its continued embedment in the Atlantic system. Decades of enlargement pushed Russia out of the agenda of a united Europe. Ideationally, the EU claims to be post-modern, in pursuit of normative value-based diplomacy. Its enlargement simply adds to moralism and again the ideational iron curtains fall. The Russia-EU escalation eventually leads to public conflicts, ending the Cold Peace. In global affairs, Russia adheres to neo-revisionism, advocating anti-hegemony multipolari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RICS, it seeks to establish an alternative international system, advancing the multipolarity of worl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Europe will influence greatly its position in global politics.

**【 Key Words 】** Euromonism, Russia-Europe Relationship, the EU Enlargement, Eastern Partnership

**【 Аннотация 】** Со времени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деи М. Горбачёва «Великая Европа» и «Великий Запад» потерпели крах, и в Европе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л доминироват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й 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онизм.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 ЕС стал стареть и постоянно внедряется в систему 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н также расширяется на восток по физическим границам, исключая Россию из единого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плана. В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ая самозанятость ЕС и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нормативно-ценност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а также расширение состава его членов только усугубляло его моральное учение, и идейный железный занавес снова опустился. Российск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привело к открытому конфликту и завершило период холодного мира. Россия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новую ревизионистскую позицию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выступает за антигегемонный плюрализм.

Она стремится создать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ую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систему в рамках БРИКС и усиливает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азделение Европы серьёзно ослабит её позици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монизм, российск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асширение ЕС, восточ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

(责任编辑 肖辉忠)